
May 2017

A Critique of Studies of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Hong Kong Literature since the 1990s: the Case of Inherent Contradiction between Nativeness and Chineseness

Shiying Xu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Xu, Shiying. 2017. "A Critique of Studies of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Hong Kong Literature since the 1990s: the Case of Inherent Contradiction between Nativeness and Chineseness."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7, (3): pp.29-36.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7/iss3/2>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香港文学文化身份认同研究批判

——以本土性与中国性的内在矛盾为核心

徐诗颖

摘要: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香港及海外不少学者利用或借鉴“第三空间”理论来探究香港文学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产生了均建立在以“本土性与中国性的内在矛盾”为根基进行论述的“边缘论”“夹缝论”和“北进想像论”三种典型看法。为突破“本土/中国”讨论框架的局限,朱耀伟试图把视野转移到“东西方,本土和全球以至东方主义/后殖民性和全球资本主义之间”进行。以上的讨论实际显示出政治因素是长期制约香港文学和中国文学关系讨论的重要原因。他们在阐释理论的过程中均暴露了学术缺陷和意识形态立场,无论在学理还是现实上都无法让人信服。

关键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香港文学; 文化身份认同研究; 本土性; 中国性; 内在矛盾

作者简介:徐诗颖,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电子邮箱: xu.6988@163.com

Title: A Critique of Studies of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Hong Kong Literature since the 1990s: the Case of Inherent Contradiction between Nativeness and Chineseness

Abstract: Since the 1990s, Hong Kong and overseas scholars have borrowed the idea of the “third space” to investigate the issue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Hong Kong literature, which has brought about three typical views: “the margin theory”, “the crevice theory” and “the theory of imagining Hong Kong moving North”, all based on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Hong Kong nativeness and Chineseness. In order to transcend the framework of “Hong Kong and China”, Zhu Yaowei shifts his vision to the framework of “East and West, local and global, orientalism/postcoloniality and global capitalism”. The above discussion shows that political factor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restraining the long-term discuss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ng Kong literature and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process of interpretation those discussions have displayed academic flaws and ideological biases, which, in theory and in reality, can hardly be convincing.

Keywords: the 1990s; Hong Kong literature; studies of cultural identity; nativeness; Chineseness; inherent contradiction

Author: Xu Shiyang is a Ph. D. student in the Research Center of New Chinese Literature of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00, Chin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cover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aiwan, Hong Kong and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Email: xu.6988@163.com

一、讨论的缘起

我们知道,香港是一个主要由大陆移民聚居而成的城市,且受英国殖民统治长达一百多年。“九七回归”话题能引发香港人高度关注其命运共同体的背后实是他们的身份认同出现了危机。正如周永新在《见证香港五十年》里写道:“没有香港华人认为自己是英国人,出外旅游

时,国籍一栏上,不自觉地填上中国人(Chinese),但持的是英国公民护照或身份证明书,完全没有中国两字,外国海关人员摸不着头脑,结果在国籍一栏上,画上交叉,或写上‘无国籍’(Stateless),有人形容香港人是孤儿,因为没有人要”(19)。由于英国政府实施统治意图的复杂性以及地理位置相较于大陆的边缘性,所以香港自鸦片战争以来便成为了各种政治力量争夺的“公共空间”,其历史书写权和发言权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文化上,

民族传统意识形态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经历多次的碰撞与交融,民族意识与殖民主义意识此消彼长。有学者将香港意识形态做了如下概括:“以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为主体,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和殖民主义文化深刻烙印的,多元化、混合型意识形态”(周毅之 165)。由此可知,香港文学是无法摆脱一百多年来中英双方共同作用下的影响的。也就是说,香港文学的文化身份一直以来都是在中英双重视角下建构起来的。威廉·布洛姆(William Bloom)曾对身份确认做出如下理解:“身份确认对任何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内在的、无意识的行为要求。个人努力设法确认身份以获得心理安全感,也努力设法维持、保护和巩固身份以维护和加强这种心理安全感”(乐黛云 张辉 331)。当“九七回归”成为香港人命运改变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时,学者们也非常希望香港文学能重新拥有自主发展的空间,以便逃离中英双重文化殖民力量的控制。因此,他们期待香港文学能形成一个既包容又超越于中国和英国文化话语力量支配下的“第三空间”(Third Space)。

“第三空间”(Third Space)是由美国学者爱德华·W·索亚(Edward W. Soja)提出并付诸实践的一个重要跨学科批评概念,来自于《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1996年出版)。索亚分析了他提出的三种“空间认识论”,即:第一空间认识论,第二空间认识论和第三空间认识论。对于“第三空间认识论”,索亚认为:“它源于对第一空间——第二空间二元论的肯定性解构和启发性重构,是我所说的他者化——第三化的又一个例子。这样的第三化不仅是为了批判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的思维方式,还是为了通过注入新的可能性来使它们掌握空间知识的手段恢复活力,这些可能性是传统的空间科学未能认识到的”(102)。“第三空间”的基本宗旨是“超越真实与想象的二元对立,把空间把握为一种差异的综合体,一种随着文化历史语境的变化而改变着外观和意义的‘复杂关联域’”(汪民安 48),所以它永远保持一种开放的姿态,为传统空间科学^①的突破提供新的可能性。此外,霍米·巴巴也阐发过“第三空间”的概念,且就此“引出了‘杂交性’(hybridity),并将它放置在‘作为他者的第三化范型’之中。以此‘杂交性’建构起反抗本质主义、解构文化帝国主义以及挑战单一现代性话语”(汪民安 49—50)。它“关心殖民空间中‘权力和统治作用于符号和主体化的过程’,关心在文化关系领域内‘象征结构或表现机制立刻转变成了社会话语的中介和政治策略的运作实体’”(赵稀方 110)。为了能有效抵抗分别来自中国和英国所形成的本质主义和中心主义,使香港文学永远保持一种不受某一文化话语力量支配下的开放多元状态,“第三空间”理论便在“九七回归”的现实背景下受到香港及海外学术界的青睐。同样,不少香港学者对于香港文学文化身份认同的认知亦是如此。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香港及海外不少学者利用或借鉴“第三空间”理论来探究香港文学的文化身份认

同问题,产生了三种典型的看法,即:“边缘论”“夹缝论”和“北进想像论”,^②并引起了大陆和香港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集中讨论。通过站在“第三空间”立场来思考问题,学者们希望能重新定位香港文学与中英之间的关系。由于“九七回归”已成定局,所以他们更多着眼于香港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那种既融合又冲突的关系。简单来说,就是探究“本土性与中国性的内在矛盾”命题。然而,从中国立场出发,我们可以看到用“第三空间”理论来定位和建构香港文学的文化身份还是有它的学术缺陷,以及蕴含着明显抵抗“中国性”的意识形态色彩,以防来自中国方面的文化殖民,害怕它会使香港文学逐步失去本土特色。具体来看,一方面,在“如何认识文化身份”这一问题上,“夹缝论”和“北进想像论”容易陷入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分析立场,从而把问题总体化和本质化;另一方面,在“如何建构文化身份”的价值立场上,“边缘论”因处于中英双重视角之外而显示出游移不定的特点。同时,用“第三空间”理论作为根基进行探讨,“即可规避极端主义的政治,而将后殖民世界表现为一个弱势声音的世界”(汪民安 50)。事实上,这三种理论的背后还是有意把自己定位成“边缘者”和“弱势者”,从而为自己在全球资本主义格局下谋取一席之地做准备。针对“混杂”^③“边缘”“霸权”等观念用于探索与中国文学之间关系的局限,朱耀伟试图把香港文学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转移到“东西方,本土和全球以至东方主义/后殖民性和全球资本主义之间”(132)的框架下进行讨论。然而,这种观点是否存在有意忽略英国殖民侵略所带来的不公平事实以及无视“大中国”的存在而直接与国际接轨的意识形态立场嫌疑呢?同时,我们知道身份意识包括政治、文化与经济等三种类型,任何一种身份都与其他两者相关(陈林侠 136—45)。学者们利用或借鉴“第三空间”理论来探讨香港文学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是否存在有回避正视与中国文学关系的意图?事实上,我没有发现上述理论有涉及这一问题的。如果不对此予以正视,那么所有关于此问题的讨论都无法在学理和现实上使人信服。这种“反抗与回避”背后所隐藏的政治因素成为了制约学者们用客观公正的眼光看待香港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因。鉴于此,本文试图对这些理论予以分析并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和商榷。同时,平心而论,香港及海外学者能将这些看法在理论上作出建构的努力是值得珍视的。

二、对三种“建构文化身份”理论的反思

在香港文学“如何建构文化身份”这一问题上,以李欧梵和也斯为代表的“边缘论”、周蕾为代表的“夹缝论”和北进想像专题小组为代表的“北进想像论”引起了大陆和香港学术界的较大反响。

(一)“边缘”背后的游移不定

一直以来,谈到“边缘”一词,很容易让人产生“被冷

落”的贬义色彩。相较于中心的边缘者而言,也较易产生自卑情绪。然而,李欧梵对此有另外一番解读:自处于边缘并不等于把自我视为“弱势”(《寻回香港文化》160)。最早探索香港文化边缘性的正是他的文章《香港文化的“边缘性”初探》。李欧梵在这篇文章里明确指出香港处于边缘地位的意义一直没有受到重视。他之所以提出这一观点的缘由是基于以下两点:(1)“柯恩的边缘论中的主要城市是上海。从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中期,香港似乎一直处于上海的阴影之下,它和上海形成了一种密切的姐妹城的关系,但上海仍处于主宰地位。同是租界口岸——也许因为香港割属英国,成了真正的殖民地——香港却变成了化外之地,边缘的边缘”(《寻回香港文化》154);(2)“香港的从属地位也是五四以来知识分子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经过多少年来的政治革命,知识分子的地位(诚如余英时所述)已经被政权逼向边缘化,但并没有改变他们的中心心态,所以他们也无法从边缘的立场透视问题,更不会对边缘地区如香港感到兴趣[……]这一种大陆知识分子的中心心态,我认为一直持续到现在,几乎没有任何人对于香港文化和历史有真正的兴趣”(154—55)。边缘立场的提出,与李欧梵前半生从流亡到边缘的个人经历有关。他愿意用积极的眼光并站在“第三空间”的立场来审视这种边缘的位置:(1)“我感到一种强力推动我积极致力于与两种文化的对话”(“身处中国话语的边缘”137);(2)“也许是意识到这种思想交战的需要,使我没有完全‘迷失’于两个大陆之间”(137)。他认为当前人们的思想模式“仍然是一元而非多元”(《寻回香港文化》159),而“打破这种二元论法(基于一元心态)的可行之径就是把自己置于两种文化的边缘地位”(159)。因此,当他把兴趣投入到对香港文化的研究时,他发现:“也许香港文化的特色,就在于它的‘杂’性,它可以处在几种文化的边缘——中国、美国、日本、印度——却不受其中心的宰制,甚至可以‘不按牌理出牌’”(161)。同样,也斯实践的“第三空间”概念与李欧梵对香港文化“边缘性”的理解有异曲同工之妙。可是在面对香港所处的“边缘”位置时,也斯持有的观点则与李欧梵相反,认为香港文学并没有以主动的姿态来接受“边缘论”。他说:“边缘性并不是一个时髦的名词,而是一个长远以来被迫接受的状态”(“香港文化”73—74)。对于香港文学的历史定位问题,学术界与文学界历来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是从“大中华”意识出发,强调香港文学与祖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和现实承继关系,将香港文学纳入中国文学的整体板块儿中进行审视;一种则强调香港文学的独立性,突出香港文学意识,以求摆脱被大陆文学阵营收编并被边缘化的命运(白杨 80)。针对这种二元对立观点长期存在的情形,也斯发出了感慨:“过去人们对现实已有了许多定型看法,不知怎的这些成套的已有看法总回答不了我由亲身感受开始的问题”(也斯艾晓明 291)。因此,一直以来,他致力于香港文学的

文化身份认同研究。尤其是在回归过渡期,无根的不安全感以及对前途的渺茫感常常困扰着他,城市的畸形发展以及港人内心迷茫无助的状态常常使他反思现状。为了更好地审视这种“边缘”处境,他试图通过“第三空间/他的空间”的视角来反省香港文学的现状,但他最后发现即使身处“局外人”位置来建构文化身份的行为也是徒劳的。可见,无论是李欧梵还是也斯的边缘论,都有助于我们在认识和建构文化身份的问题上避免陷入简单的二元对立分析问题的立场,但同时二者目前也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陷,那就是在面对文化身份建构问题上所持有的价值立场显示出游移不定的特点。李欧梵极力强调自己能身处边缘位置是一种难得的机会,能够避免像有中心心态的人那样犯“为我独尊”的毛病。相反,也斯对此则比较悲观,认为身处边缘的位置让香港文学无法找到精神归属,永远只能处于寻找文化身份的归途之中,所以没办法回答“香港文学的命运该何去何从”等类似问题,只能继续用“第三空间”的视角来反省自身。无可否认,也斯通过不断变换观察大陆的角度来审视香港文学文化身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将问题简单化和本质化,如:在《古怪的大榕树》一文里,面对香港与大陆不同的属性,他用“复杂变幻”来表明他的立场。然而,这些观点极有可能因把香港文学从中英双重视角下抽离孤立出来看问题而陷入另一种的中心主义。一方面,香港的命运与中国大陆息息相关。如果只是一味强调身处边缘而极力回避审视与中国文学的密切关系,那么香港文学将永远处于漂泊无根的状态,无法找回自己的“精神原乡”。另一方面,身处边缘位置是否就能够完全排除西方殖民主义在殖民时期对香港文学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就像周蕾所说的:“‘后现代混杂派’^④欲倾向于轻轻带过殖民主义对被殖民者的后遗恶果,漠视即使在殖民地独立之后仍然长期存在的普遍贫穷、依赖性与积弱等现象”(100)。李欧梵以身处西方中心视野下的边缘位置为香港文化所归纳的“杂”性特点仅仅强调了其多元化的一面,就是希望能够糅合并超越中英双重视角下的影响从而突显边缘者声音,可这也很容易落入另一种本质主义的泥潭。更重要的是,过度强调“杂”的因素便失去了自己的价值评判立场,不仅会轻易抹掉西方殖民主义在殖民地独立之后仍然留下的痕迹,而且不正视香港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也有可能为了掩饰香港文学与新殖民主义共谋的意图,企图通过站在边缘位置以便为自己在全球化的论述格局中谋求发声的机会做准备。朱耀伟对此也谈到,美国华裔学者的边缘位置,不过是以“自我放逐”为名换取了在西方可以发声的合法边缘位置。需要警惕的,是他们与西方“中心/边缘”主导结构的共谋关系(赵稀方 246)。

(二)“夹缝”中的生存与逃离

至于第二种以周蕾为代表的“夹缝论”则是概括港人面对“回归”已成事实的情况下所表现出来的集体焦虑症

典型。在周蕾看来,香港历来都是被各种话语力量争夺的“公共空间”,而且“夹缝论”尤其针对的是香港和中英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国而言,她认为:(1)“香港的现代史从一开始,就被写成为是一部对中国身份追寻的不可能的历史”(周蕾 109);(2)“香港对中国的追寻,只会是徒劳的:香港愈努力去尝试,就愈显示出本身‘中国特性’的缺乏,亦愈偏离中国民族的常规。这段历史紧随着香港,像一道挥之不去的咒语,令香港无法摆脱‘自卑感’”(109)。另一方面,“夹缝论”是基于后现代混杂派观点的不足而提出来的,主要针对的是西方殖民主义给后殖民时期的香港所留下的消极影响。周蕾认为:(1)“后现代混杂派的论述最大的诱惑性是,抹平了过去的不公义现象,只管吸引人去参与这个全球资本主义的权力世界”;(2)“‘后现代混杂派’不再谈论‘后殖民’中的‘殖民’,取而代之,他们的重点在于‘后’——严格意义上的‘以后’和‘终结’(over with)”;(3)“像在香港这个空间里,后现代混杂派就会集中批评中国的民族主义(即所谓‘民族的保守主义’),而不会批判英国的殖民主义(因为它等同‘国际的开放性’)”(100—101)。作为一个殖民地,周蕾认为由于今天的香港是一个由中英双重话语力量碰撞交融下形成的“第三空间”,所以便得出以下结论:“香港最独特的,正是一种处于夹缝的特性,以及对不纯粹的根源或对根源本身不纯粹性质的一种自觉”(101)。同时,“第三空间”的特质使“香港的日常生活与发展一早就被看成是‘腐朽’的,所以香港对文化纯洁性没有幻想,也不会对可能被‘平反’而感到兴奋”(101)。面对如此进退两难的生存困境,周蕾借用罗大佑的话指出“在夹缝中求生存”是建构香港文学文化身份的前提,并进一步将这种境况解释为:“这个后殖民的城市知道自己是个杂种和孤儿”(101)。我们知道,“杂种”和“孤儿”是两个充满浓重贬义色彩的词语。周蕾把“第三空间”理论作为“夹缝论”的理论支撑来概括香港文学文化身份的背后实际上包含着强烈的自卑和敌对情绪,主要是害怕将来会遭到来自中国方面的文化霸权的控制。因此,她把“九七回归”当作是香港被再一次侵略的事件来看待,并对回归后的香港前途表示忧虑:“应该如何去讨论一个被逼回归‘祖国’的后殖民地区?特别因为这个‘祖国’与以前的殖民者是同样地施行帝国主义政策的?”(94—95)。为了使“第三空间”理论与“夹缝论”联系更密切以产生新的阐释可能,她引用了罗贵祥的看法:“香港不会以延续的纯民族文化为自傲;反之,它的文化生产往往是一种特殊的协商。在这个协商之中,它要穿梭周旋于中、英这两个侵略者之间,努力寻找自我的空间,而不要沦为英国殖民主义或中国权威主义的区区玩偶”(102)。因此,当探究“如何才能在中英双重视角的夹缝生存中求得确切身份”出路时,她认为:(1)“香港第一样要从‘本土文化’内部对抗的,是绝对全面化的中国民族主义观点”(99);(2)“在香港问题上,于拆解‘英国’的同时,也要质询‘中

国’这个概念”(98)。“把回归祖国视作再一次被殖民”的观点实际上也代表了一部分香港学者害怕香港文学将会失去自我特色的看法,但这并没有缓解她对回归祖国的焦虑情绪,更无益于她客观看待和定位香港文学的文化身份。在我看来,“夹缝论”具有以下两个显著特点:(1)将香港定位为“杂种”和“孤儿”主要是为了摆脱中英双重文化话语力量对香港的挤压,从而以“受害者”的身份为寻求一个特殊独立的“第三空间”做舆论准备;(2)“对中国身份无法追寻”的自卑感使香港文学一直以来都无法正视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话语背后伴随着强烈抵抗“中国性”的意识形态色彩,并没有为有效建构文化身份形成客观冷静的学理性论述。正如朱立立在《意识形态与文化研究的偏执——评周蕾〈写在家国以外〉》一文所说的:“其香港文化想象局限于线性现代化迷思,忽略了对香港文化内部复杂结构的把握,对中华性的分析批判缺乏学理性,主观情绪不时妨碍了理性思考”(136)。为了使抵抗“中国性”的愿望得以实现,周蕾在分析问题时有意识出现代化香港的优越性。余伟君在为周蕾的《写在家国以外》(英文版)写书评时就特别指出了这点。周蕾说:“作为一个殖民地,香港不就是中国的未来都市生活的范例吗?如果我们接受只有在后殖民时代中,中国城市的现代性(正如其他非西方城市的现代性一样)才能最明确地被界定这个说法,那么香港在过去一百五十年间,其实已经走在‘中国’意识里的‘中国’现代化最前线了”(102)。可见,这种强烈抵抗“中国性”的色彩已经让周蕾陷入另一种的中心主义而无法真正建构香港文学的文化身份。陈丽芬对此也提出:“周蕾曾经猛烈地抨击‘身份’、‘本源’等观念,然而当谈到她自己的文化身份——尤其是专业身份时——她立刻限于一种本质主义与乌托邦的论述模式中”(赵稀方 250)。鉴于此,她是否想过在质询“中国”这个概念的同时,也应该质询一下“香港”这个概念?当她质疑“后现代混杂派”用“混杂”等典型观念抹平过去西方殖民主义对香港的不公平统治时,是否自己也陷入了同样的泥潭,即把问题总体化并忽略了香港内部的复杂性力量(包括分别从殖民力量和非殖民力量出发论述问题),从而无法真正有效看清问题的本质?正因为没办法对这点做出合理的回应,所以周蕾在阐释“夹缝论”时所针对的对象是香港文学与中国的关系,而对香港文学与英国的殖民关系则回避做出详尽的分析。我认为这种回避属于有意为之,因为从“夹缝论”反映出来的对抗“中国性”的思路上明显可以看出她是以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来审视香港文学的文化身份问题,并没有为“混杂”理论的学术缺陷提出新的解决思路。这不得让我们有所警惕。无可否认,周蕾当年在反思香港后现代和后殖民话语方面是富有前沿性的,并表现出鲜明的理论锐气,但过于强调本土的立场来对抗“中国性”的意识形态色彩,以突显自我身份的优越性意图已经把问题引向本质化和总体化。这无助于她看清香港文学

与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在分析“如何建构文化身份”这一问题上也就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三)“北进想像”下的殖民霸权意识

“北进想像论”^⑤则是针对“夹缝论”的学术缺陷以及香港文学的发展现状提出来的。它同样借鉴了“第三空间”理论,“从探讨香港身份的讨论出发,从政治、经济发展,大众文化的传播,现代商业广告与营销策略等方面阐释‘香港资本主义政经文化的地区性霸权’,用‘北进殖民主义’概念重新审视‘边缘香港’与‘中国大陆’之间的文化政治和权力关系,并对‘夹缝想像’的局限性提出批评”(白杨 176)。他们认为“夹缝论”为突显自身作为“受害者”的清白而将香港与大陆之间的关系做了简单化的处理,忽视了香港资本与其他地方联合起来所形成的北进殖民霸权的现实。这从改革开放后香港的经济和文化均“向北侵略”的现象就可证实。这一理论并非毫无来由,在此之前陈光兴也提出了台湾“次帝国”^⑥的意识形态正在形成,并在具体表现上与“北进想像论”有契合之处。经济上,港人通过“北进”来达到向外扩张。卢思骋在《北进想像——香港后殖民论述再定位》中提到香港对中国大陆所实行的资本主义霸权行为已经非常明显,“自八十年代中起,资本家在工业再结构的口号下便开始将工厂和资金大量北移,利用微薄的工资、不人道的工作与居住环境,剥削珠江三角洲(以及北方南来的民工)的廉价劳动力,榨取巨大的剩余价值[……]此外,香港文化工业不单成为了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普及文化的霸权,在北进的洪流下亦乘势攻占大陆市场,将港式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散播到社会主义祖国。虽然香港仍是英国殖民地,而且九七后也很可能成为中国的殖民地,但这些不同层面的北进实践会否意味着一种北进殖民主义正在慢慢形成?香港会否在去殖民化之前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准殖民者或类殖民者?”(陈清侨 5)在叶荫聪看来,香港自成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地区后,与中国的关系究竟是殖民者还是被殖民者依然很难界定。《边缘与混杂的幽灵——谈文化评论中的“香港身份”》一文里强调不应该直接把香港从被殖民者转变成殖民者,因为这样还是会陷入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应该看到香港与大陆内部的差异以及两者资本权力间的互动所造成的强劲势头,“当中的问题已非香港是否文化侵略大陆,而是香港与大陆中的主导集团如何形成文化霸权,以新殖民者的姿态,向某地区人民进行经济文化殖民”(陈清侨 45)。除此之外,港式文化把香港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融入到社会主义的日常生活,对大陆受众形成了强大的影响力,从而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们的意识形态构造。因此,他们认为“夹缝论”就不能对以上的现象做出合理而有效的解释。这两个方面共同形成了“北进想像”专题小组讨论思路的来源。然而,在我看来,这未必能切实缓解香港学者的忧虑情绪。试图反拨港人作为中英双重视语力量争夺下的“受害者”形象虽然有助于我们反思香港文学当下的发展现状,但也

存在矫枉过正的急切意图。同样把香港文学定位为超越中英双重视语力量之外的“第三空间”,“北进想像论”更希望改变被歧视的现状,成为有尊严和自主权利的“傲视中英的中心”(赵稀方 255)。同时,将大陆改革开放初期的发展与香港的经济和文化联系起来一定程度体现出为港人在面对“九七回归”时产生的忧虑和恐慌情绪进行反拨的典型心态,并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膨胀色彩。由此可见,一方面,“北进想像论”虽然表面上强调香港与大陆的主导集团已形成霸权来“殖民”大陆这一现象,但众所周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港资只是占大陆引进资金的一部分,并没有形成像“北进想像论”所认为的“港资殖民大陆”的局面,所以隐藏在这种自负现象的背后更多是一种无法释怀的自卑感和对抗“中国性”的心理,由此便很容易陷入另一种的本质主义。因此,“北进想像论”也没有办法对香港文学的文化身份予以正面回应,只能得出像卢思骋的“九七后也很可能成为中国的殖民地”这种把“回归后的香港视为再次被殖民”的观点来看了。另一方面,当他们把一个整体的香港视作“殖民者”来分析问题时,并没有看到其内部权力机制的复杂性。正如李小良所分析的,“北进想像”专题的诸篇文章实际上对“香港的北进资产阶级”没有界定,这样做不仅不利于揭示“谁是殖民者”的问题,而且对“北进想像”的反思也有把“香港”概念本质化的趋向(陈清侨 104)。对以上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它与“夹缝论”并没有实质性区别。事实上,“北进想像论”仅看到香港北上殖民的一面,却忽视了大陆与香港在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相互支持的现实。在经济方面,两地在经济上各具优势,双方加强合作,互相取长补短,是符合两地经济发展根本利益的(陈多 蔡赤萌 89)。随着大陆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大陆利用香港的综合优势从而为其经济建设服务。据经贸部统计,从1979年至1995年,港商回内地投资设立的企业已超过14万家,实际投入金额高达800亿美元,均占全国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和实际投资总额的60%左右(84—85)。同时,大陆已经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强大支柱。香港利用大陆的各类优势进行产业升级,从而发展自身经济,比如说:香港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在拥有充裕资金的同时,必须有庞大的高素质科技人才为依托,要有强大的基础产业和现代原材料工业做后盾,而内地恰恰具备这几方面的特殊优势(91)。然而,由于亚洲金融风暴等对香港经济带来巨大冲击,近年来香港的经济实力有所下滑,而内地经济正逐步崛起,所以才使香港人的经济优越感逐步丧失,2006年香港政务司司长许仕仁也说了“香港会边缘化”这样一句话,害怕“边缘化”成为当下香港人讨论的热点。在此情况下,不少港人选择北上与大陆合作,希望能寻求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同时,在文化交流上,香港与大陆的合作日益加深,不少香港文化工作者北上与大陆文化工作者进行全方位合作,在各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总体来看,这并没有产生诸如之前所分

析的“北进殖民主义”现象,香港并没有由“边缘者”转变成“被殖民者”“准殖民者”或“类殖民者”,所以“北进想像论”也就自然而然地不攻自破了。

三、“本土/全球”论: 反拨“中国性”研究范式的悖论

从分析并反思以上三种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理论后可知,学者主要还是把香港文学文化身份要不集中在中国大陆和西方殖民者的双重视角下研究(如:边缘论),要不就是通过分析香港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来予以定位和建构(如:“夹缝论”和“北进想像论”),从而将“自我他者化”。香港其实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享受全球(西方)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又抗拒西方殖民,所以一方面急切认同自己的中国人身份,另一方面又担心九七之后失去自主”(朱耀伟 268)。由此可知,其暧昧而尴尬的反殖民态度是非常明显的,从而导致了学者无法在文化身份认同这一问题上取得共识。其实,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学者将“混杂”“边缘”“霸权”“第三空间”等理论引入探究文化身份认同问题的讨论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这有助于拓宽学界对香港后殖民文化研究的思考,但最后又陷入了多方立场争论的泥潭而无法自拔。

针对香港后殖民文化研究陷入困境的情形,朱耀伟提出的观点值得深思,也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就是这些“混杂”“边缘”“霸权”等观念是在“中国性”的大论述之下谈的。他首先指出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都有阐释“中国”的焦虑,焦虑产生于他们并没有认清如下现状:在日渐全球化的生产中,每个人都有阐释“中国”的权利,而这种阐释的过程也是不同的话语主导力量重新建构“中国”的过程。他得出该看法的来源有:(1)“从上引九十年代两岸三地的后殖民研究来看,后殖民研究未能反思自己所处的场域的复杂权力关系,在不自觉或不情愿下将权力关系化约为二元的激进和保守之争,最后无法突破弱势论述的窠臼。易言之,不同论述只争相视自己的身份认同为最有效的‘天然资源’”(朱耀伟 277);(2)“边缘论述正因合法性条件所限,往往未能洞察戴力克所言第三世界批评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共谋,而两岸三地的后殖民研究亦有变成了一种有利全球化的一种以抗衡为姿态,实则倒过来淡化抗衡力量的工具的危险”(278)。因此,争论双方对“中国性”的理解就会与自己所处的位置有所关联,并都把与自己合法性条件相关的内容作为其阐释话语背后的支撑。鉴于此,后殖民研究的重点由反霸权转变成以反霸权为工具在全球化的论述格局中为自己重新定位,并最终与新殖民主义形成共谋。回望香港九十年代的后殖民文化研究,他也发现存在着类似阐释“香港”的焦虑,并指出:“我们看到的主要是‘香港’的阐释问题,可能在以‘香港’增补了‘中国性’的多元向度之同时已经复制了‘中国性’的阐释焦虑所隐含的暴力,即

以香港作为批判中国的时候呈现了阐释‘香港’的焦虑,当中又因而复制了阐释‘中国’的权力关系”(272)。因此,他期望在全球化的生产年代里,应把香港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转移到“东西方,本土和全球以至东方主义/后殖民性和全球资本主义之间”(132)的框架来探讨。具体来说,就是:“也许在二十一世纪的后殖民研究中,最急切的是要摆脱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二元框架,不再在第三世界批评的有限场域中争取一己的‘中国性’的合法性,而是将战场转到‘第四世界’——在包括第一和第三世界在内的不同地方都共有的社会排除机制中的弱势社群”(278)。

然而,我认为朱耀伟的理论缺陷恰恰出现在这里。首先,为了摆脱阐释“香港”的焦虑和复制“中国性”的阐释焦虑所隐含的暴力等问题,他用“本土/全球”的视角来回避正视香港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这种思路实际上有无视“大中国”的存在而与国际直接接轨的嫌疑。更进一步来说,这也是一种潜在对抗“中国性”的表现。他的理论来源于卡尔斯泰斯关于全球化的“国际分工”论述。基于此,他在《谁的“中国性”?九十年代两岸三地的后殖民研究》一文里认为:(1)“在全球资讯年代(也就是全球化论述生产年代),中心/边缘甚至全球/本土的二分框架再不能解析新的经济格局,‘国家’的观念也变得很有问题”(274);(2)“在全球化论述生产年代,文化边陲的抗衡早被纳入全球格局中,‘国界’再非划定中心和边缘的良方妙药。本来是边缘论述的‘中国性’因此早已跨越边界,变成全球化论述生产的共有课题”(275)。试想,香港文学的文化身份难道真能跨越大中国的存在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定位和建构起来吗?如果一味拉开与中国文学之间的距离,那么香港文学是难以确切定位好自己的文化身份的,也必将再次失去发出本土声音的权利。因此,认清和确立身份的第一步就需要正视自身与中国文学之间关系。其次,如何理解“本土/全球”里面的“本土”?在我看来,朱耀伟理解的“本土”是指他最后将目光转移到的“第四世界”,即“在包括第一和第三世界在内的不同地方都共有的社会排除机制中的弱势社群”(278)。然而,这里有两点想与之商榷。其一,我相信朱耀伟是懂得“普遍性与特殊性”这一基本哲学原理的,但为什么谈到弱势社群时就如此急切地一概而论呢?当最后下结论时,他只是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小结,并未对“社会排除机制中的弱势社群”这一概念做出具体阐释。事实上,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对“弱势社群”的定义都会有所不同。中国法学会教授郭道晖曾对“弱势”概念作出如下分析:“‘弱势’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相对于‘强势’(也包括‘中势’)。其相对性随时空条件和衡量坐标不同而有差别。在相对性中,又有相对中的绝对弱势和绝对强势的不同。就相对性而言,不只是一般地相对于强势,而是在不同领域中(如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各有其弱势和强势。领域转换,其强弱地位也可能变换”(“关注社会弱势群体”19)。若将此概念运用到分析香港的“弱势社群”同样可以得出

如下结论：“英国殖民时期的弱势社群”和“回归中国后的弱势社群”的指涉肯定有所不同，而且在香港本土内部也有其分别对应的“弱势社群”和“强势社群”。以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为例。从整体层面来看，如果将英国本土殖民者看作是强势社群，那么被殖民的英籍华人、香港人和中国人就是弱势社群。可如果以除英国本土殖民者之外的内部结构作分析，那么处于社会上层的英籍华人就是强势社群，相对应底层的香港原住民和移民来香港的中国难民就是弱势社群。同样，对“回归中国后的弱势社群”也可以做出类似的分析。比如说：在各领域有实力有名望的中国人是强势社群，而底层的蚁族居民或者未能取得香港永久居留权的打工族就是弱势社群等。遗憾的是，朱耀伟为了实践他的“本土/全球”理论，就急于对此下结论而未能做出更有针对性的阐释。如果在朱耀伟看来关于“弱势社群”的含义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一样的话，那么这是否有意忽视英国殖民侵略给香港人所带来的不公平的现实？比如说，英殖民统治时期的华人上层精英群体在英殖民主义者看来也属于弱势社群，那么回归中国以后这个群体在朱耀伟看来是否还属于弱势社群呢？其二，由于朱耀伟注意到香港文学正利用自己的特殊位置在全球资本主义格局中谋利，所以他想超越国界而用全球化的眼光来重新审视香港文学的文化身份，且用“弱势社群”作为香港文学发声的力量来抵抗当地的精英文化权力机制、大中国以及全球各地的文化霸权机制，并由此得出如下结论：将香港与全球的关系定位为“弱势社群者/全球霸权者”，而限于之前“本土/中国”的论述机制。然而，这是否还是落入了简单的“二元对立”阐释窠臼？“本土/全球”论虽然初衷是想消除不同话语力量对“香港文学”阐释权的激烈争夺局面，从而把注意力转移至用更平等的眼光来关注全球文化霸权力量给弱势群体所造成的影响，这是较为合理的一面，但往更深层次考察的话会发现它实际上有抹平地区性文化身份差异的意图，成为了后殖民香港文学研究的学术缺陷。更为严重的是，把研究对象整合成“弱势社群者/全球霸权者”的做法为香港文学独立于大中国之外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利的理论支撑。可以这样说，回避讨论香港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并未使他的初衷得以实现，也未能真正有效缓解回归中国的焦虑。之所以出现这种原因，我认为与他同意周蕾对后殖民研究的看法有关。周蕾说：“我心中的‘后殖民研究’是一种有能力不断质疑体制化知识和随之而来的阶级和不平等的持续情况（面对种族、族群和文化差异）的学问[……]”（278）。之前在第二节里我们已经知道周蕾产生把“香港”看作“杂种”和“孤儿”并以此对抗“中国性”的观点是建立在以香港与中国存有诸多方面的不平等这一前提之上进行讨论的。由于朱耀伟认可周蕾对香港文学后殖民研究的质疑态度，所以他说：“唯有对后殖民研究保持警觉，才能维持这种持续的质疑”（278）。由此可知，“本土/全球”论虽然表面上反思和弥

补“边缘论”“夹缝论”和“北进想像论”的学术缺陷，但实际上与后者并无本质区别，尤其因越过“中国性”所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色彩与后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不能不让我们有所警惕。朱耀伟虽然不愿意成为话语霸权者，但最后还是不自觉地陷入之前所反对的试图在阐释“香港文学”中的“香港”时为自己夺取一席之位的泥潭。

结 语

无论是“边缘论”“夹缝论”“北进想像论”抑或是朱耀伟的“本土/全球”论，他们均从“本土”立场出发来探究香港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以求为香港文学文化身份进行定位的努力是值得珍视的。这对吸收并挖掘更多香港本土文学资源以及文化机制的确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具有显著理论和现实意义。只不过，在引用“第三空间”理论时学者们因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而未能客观全面地审视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把香港文学一直以来处于弱势地位的原因归结于中国文学这一本质中心的存在。在“香港回归”这一大背景下，这种恐惧感便愈发增强，害怕香港文学将要接受来自中国方面的文化殖民。实际上，政治因素成为了长期制约香港学者客观公正讨论二者关系的重要原因。这种思想偏见使得“第三空间”理论并未在香港实现本土化和语境化，也就是说以上所提及的四个理论并未有效缓解香港学者建构香港文学文化身份的焦虑感。诚然，香港学术界发表属于他们的区域性观点无可厚非，但一切的讨论（包括理论引进）仍需建立在客观公正看待香港文学与中国文学二者关系的前提之下。否则，无论在学理还是现实上都无法让人信服。

注释[Notes]

- ① 指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的思维方式。
- ② 目前涉及香港文学文化身份认同问题的讨论已经很多，但普遍处于重复论述的情形，并没有跳出“边缘论”“夹缝论”和“北进想像论”这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故本文拟以这三种观点作为分析对象，特此说明。
- ③ 指前面霍米·巴巴所引出的“杂交性”。
- ④ “后现代混杂派”这个称谓是周蕾概括的，她认为：“正如那些鼓吹本土主义的人一样，鼓吹后现代混杂性的人（我就姑且称他们做‘后现代混杂派’（postmodern hybridites）吧）典型地浑忘了被殖民文化中重要的现实部分。”参见周蕾：《写在家国以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00页。
- ⑤ “北进想像”专题发表于1995年《香港文化研究》第3期，由“北进想像”专题小组署名、卢思聘执笔的《北进想像——香港后殖民论述再定位》、罗永生《后殖民评论与文化政治》、叶荫聪《边缘与混杂的幽灵——谈文化评论中的“香港身份”》、孔浩烽《初探北进殖民主义——从梁凤仪现象看香港夹缝论》、谭万基《没有陌生人的世

界——佐丹奴的世界地图》5篇文章组成。

⑥“次帝国”是指帝国主义下的依赖性次级帝国。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白杨:《文化想像与身份探寻——近五十年香港文学意识的嬗变》。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

[Bai, Yang. *The Culture Imagination and Identity Explor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Subjectivity in Hong Kong Literature in the Recent Five Decades*. Changchun: Jilin People's Press, 2006.]

陈清侨:《文化想像与意识形态》。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

[Chan, Ching-kiu. *Cultural Imaginary and Ideology: Critical Essays in Contemporary Hong Kong Cultural Politic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陈多 蔡赤萌:《香港的经济(一)》。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年。

[Chen, Duo, and Cai Chimeng. *Economy in Hong Kong (One)*. Beijing: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1996.]

陈林侠:“香港的焦虑:政治意识、‘再殖民’及其身份认同的前瞻——以《建国大业》、《风声》在香港的传播为核心”,《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2010):136—45。

[Chen, Linxia. “The Anxiety of Hong Kong: the Prospect of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Re-colonization’ and Identities: the Spread of The Founding of a Republic and The Message in Hong Kong.” *Drama (The Journal of the Central Academy of Drama)* 2 (2010): 136-45.]

周蕾:《写在家国以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

[Chow, Rey. *Writing Diaspora: Tactics of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朱耀伟:《本土神话:全球化年代的论述生产》。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2年。

[Chu, Yiu Wai. *The Local Myth: Discursive Production in the Global Era*. Taipei: Taiwan Student Book, 2002.]

郭道晖:“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法学视角的几点思考”,《河北法学》7(2005):18—20。

[Guo, Daohui. “On Social Vulnerable Groups: Thoughts from the Legal Viewpoint.” *Hebei Law Science* 7 (2005): 18-20.]

李欧梵:《寻回香港文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Lee, Leo Ou-fan. *Return of Hong Kong Culture*.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3.]

——:“身处中国话语的边缘:边缘文化意义的个人思考”,季进、宋洋译。《当代作家评论》1(2008):

132—41。

[---. “On the Margins of the Chinese Discourse: Some Personal Thought on the Cultural Meaning of the Periphery.” Trans. Ji Jin and Song Yang. *Contemporary Writers Review* 1 (2008): 132-41.]

也斯:“香港文化专辑·引言”,《今天》28(1995):73—74。

[Liang, Bingjun. “Special Issue on Hong Kong Culture: Introduction.” *Today* 28 (1995): 73-74.]

——:《寻找空间》,艾晓明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

[---. *Looking for Space*. Ed. Ai Xiaoming.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1994.]

爱德华·W·索亚:《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陆扬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

[Soja, Edward W.. *Third Space: 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 Trans. Lu Yang, et al..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5.]

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Wang, Min'an. *Key Words in Cultural Studies*.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7.]

乐黛云 张辉:《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Yue, Daiyun, and Zhang Hui.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Literary Imag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9.]

赵稀方:《后殖民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Zhao, Xifang. *Postcolonial Theor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周永新:《见证香港五十年》。香港:明报出版社,1997年。

[Zhou, Yongxin. *Witness to Hong Kong in the Past Fifty Years*. Hong Kong: Ming Pao Publications Ltd, 1997.]

周毅之:《香港的文化》。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年。

[Zhou, Yizhi. *Culture in Hong Kong*. Beijing: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1996.]

朱立立:“意识形态与文化研究的偏执——评周蕾《写在家国以外》”,《文艺研究》9(2005):136—43。

[Zhu, Lili. “The Prejudice of Ideology and Cultural Studies: A Review of Writing Diaspora: Tactics of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Written by Rey Chow.” *Literature & Art Studies* 9 (2005): 136-43.]

(责任编辑:王嘉军)